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丁玲和成仿吾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统稿,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3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文章。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也没有收入《遵义日记》等5篇文章。

这几篇文章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宣传工作者认为,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与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如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子鸡的质量越做越差,还记述了自己把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反而对遵义会议没有一字的描写。这和当时对长征“吃草根、扒树皮”、“爬雪山、过草地”的程式化叙述显然不相符。

其实,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

但在长征途中,红军一路宣传革命、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当

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无敌情顾虑(时),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虽然没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道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遵义日记》等5篇文章也变得“顺理成章”。

2006年,《红军长征记》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书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遵义日记》等5篇文章被全部补上。这些质朴的记述,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长征。(文/高华 据《炎黄春秋》)

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先后分3次举行。与会的百余名代表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艺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之后,作家萧军第一个“开炮”。萧军说:“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胡乔木站起来反驳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争论得最激烈。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胡乔木针锋相对:“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在这次会议上,吴奚如的发言受到

朱德的点名批评。吴奚如说:“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的朱德站起来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现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而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5月23日的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又讲了一次话,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依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当天的会上,毛泽东作了结论讲话,明确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写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文/朱鸿召 据《新闻午报》)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争论